

建设永远为人民绽放的影视百花园

□王一川

当前中国影视艺术迫切需要向着建设“永远为人民绽放”的“百花园”这一目标前进,应当在现有的繁荣发展基础上借鉴“左联”电影理论批评的经验,坚持“大众”或“民众”的根本立场,坚持观察和关怀“民众”的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发扬基于“批判”精神的“真善美力”原则,更好地积蓄通向世界影视强国的强大能量。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影视艺术坚持为人民的宗旨,坚持源自人民生活、为了人民和服务于人民,焕发了新的生机,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精品佳作。在此背景下重温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有关理论和批评建树,可以增加对人民文艺的厚重历史感和敏锐现实感的真切体认。

成立于1930年的“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代表中国共产党有组织地领导文艺的真正开端,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文艺界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开端。鲁迅摘译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电影理论家岩崎昶新著《电影和资本主义》,引导中国电影家重点关注“大众”。“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左联成员纷纷拿起文艺理论及电影批评的武器,为了启蒙“大众”而奋斗。瞿秋白积极翻译、介绍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观,指出文艺典型的作用在于帮助读者“真正彻底的充分的‘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更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同时要求坚决破除资产阶级艺术“迷魂阵”,批评《火烧红莲寺》等影片“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他严正地倡导“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要求“向大众说人话”,强调“现在所要创造的,是真切的做法……都首先要放在大众的基础上!”他以鲁迅杂文为典范指出:“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这里着力伸张以艺术形式表现政治立场,深刻地观察社会和为“民众斗争”服务等艺术原则。

由于初步确立了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立场以及以“大众”现实生活为创作对象的方向,“左联”大力推进左翼电影运动,主张中国电影“赤裸裸地把现实的矛盾不合理,摆在观众的面前,使他们深刻地感觉社会变革的必要,使他们迫切地找寻自己的出路。这也是中国电影界的一条崭新

的路。”与此同时,左翼电影界注意探讨为大众服务的中国电影的“建设”规划。洪深等15位电影理论批评者在为《晨报·每日电影》副刊撰写的宣言式文章中庄严承诺:“将勇敢地在公正的立场上发扬它青春泼辣的精神,为银色的世界,开发出一颗真的、善的、美的、力的果实,而给予人们以不平凡的满足”。这里郑重地在基本的“批判”立场上提出“真善美力”这四条新的电影艺术原则。这种对于中国电影的批判的和建设的态度,促进了为大众的现实主义电影佳作的诞生,如《渔光曲》《桃李劫》《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

在“左联”时期初步提出并探讨的文艺为“大众”以及文艺面向社会现实等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确立起文艺为人民的根本原则。毛泽东首次明确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我们的文艺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强调“为人民大众”的原则才真正是文艺的“根本原则”,并首次明确地回答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人民生活”才是文艺“唯一的源泉”。从此,中国现代文艺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接连涌现出歌剧《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小说《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解放区文艺佳作。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文艺沿着这一大方向继续开拓,创作了一批批人民大众喜爱的影视作品,如《白毛女》《南征北战》《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地道战》《小兵张嘎》《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等。邓小平进一步确立了“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继续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明确“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并在“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这也催生了一批批“新时期”影视佳作,如电影《巴山夜雨》《天山传奇》《邻居》《芙蓉镇》《人生》《老井》《野

山》《本命年》《香魂女》等,电视剧《渴望》《我爱我家》《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大宅门》《亮剑》《潜伏》《士兵突击》《大明王朝1566》《温州一家人》等。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文艺为人民和人民的文艺等当前中国文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同时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宝藏”和“重要源泉”,勉励文艺家“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新时代文艺要以人民为主角,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赞扬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反映人民根本利益,贴近人民感情,传达人民心声,满足人民的多样化、多层面、跨媒介、融媒体等审美需求。新时代文艺管理者和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以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领导或促进文艺事业,为创作人民喜爱的更多更好文艺精品、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而努力。中国影视沿着人民文艺方向锐意开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宝藏,诞生了一批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等分别完成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决胜脱贫攻坚战及建党百年等重大节庆主题创作任务,以一群普通人为主人公,讴歌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电影《奇迹·笨小孩》《中国机长》《守岛人》《中国医生》《人生大事》《万里归途》《长沙夜生活》等热情赞扬人民群众在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业绩和卓越奉献。电视剧《大江大河》《装台》《山海情》《人世间》《大山的女儿》《高山清渠》《狂飙》《县委大院》《去有风的地方》《风吹半夏》《漫长的季节》等从不同侧面全面展示了普通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大江大河中翻江倒海的开创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坚守仁义和互助原则的传统美德、在脱贫攻坚战中团结奋斗和仁厚有为的工作作风、



在乡村振兴和新时代文化开创新精神等高品质。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重新诠释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神、表现中华文明史高峰气象,突出普通人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贡献,在动画领域掀起“中国风”的新高潮,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做出了新的美学建树。

中国正走在从世界影视艺术大国向世界影视艺术强国迈进的发展道路上,发展势头喜人,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局部存在纯娱乐、消遣、低俗趣味等不良风气,存在“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这里的一个“中心”和两个“最高”,是基于“为人民”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对新时代影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既不是文艺家的孤芳自赏,也不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霸道歪风,而是建设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并且“永远为人民绽放”的“文艺的百花园”。这要求中国影视艺术要永远秉承为人民创作的宗旨,“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从而让人民群众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永远的“百花园”中享受到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倾力回报。

当前中国影视艺术迫切需要向着建设“永远为人民绽放”的“百花园”这一目标前进,应当在现有的繁荣发展基础上借鉴“左联”电影理论批评的经验,坚持“大众”或“民众”的根本立场,坚持观察和关怀“民众”的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发扬基于“批判”精神的“真善美力”原则,更好地积蓄通向世界影视强国的强大能量。这里的“批判”精神,是说中国影视艺术对于自身已经取得的成绩,应当运用人民立场,采取冷峻的反思性态度,随时随地检讨过往得失,养成及时修正和提高的能力。真的原则,表明中国影视艺术应当以人民的眼光,遵循可信可靠的历史感、客观冷静的现实反映态度和绝不弄虚作假骗人的创作戒律;善的原则,表明中国影视艺术应当以为人民鼓与呼的社会责任感,善于以仁厚温和的态度应对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人民性问题;美的原则,表明中国影视艺术应当自觉地以美化人,以美的力量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力的原则,表明中国影视艺术应当具有激励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以及开创崭新未来的能动的创造性力量。总之,当前中国影视界应坚持人民文艺立场,为建设基于“批判”精神的、盛开“真善美力”芳香的、“永远为人民绽放”的中国影视“百花园”而努力开拓、耕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对真实的共同追求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纪录片与报告文学“双向奔赴”学术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许莹

8月31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区政府承办的纪录片与报告文学“双向奔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旨在为报告文学与纪录片行业的专家、纪录片制作机构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深度挖掘报告文学与纪录片的融合发展,探索纪录片的文学属性,促进中国纪录片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苏出席会议并致辞,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余雷出席会议。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宏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纪红军、李春雷、李青松,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丁晓平,中国水利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学儒等报告文学作家与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所所长、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赵捷,首都纪录片发展协会会长陈大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原办公会成员陈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教授张雅欣,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晓蒙等纪录片行业专家展开交流研讨,对真实的共同追求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会议由原中央电视台导演、国家一级编剧夏蒙主持。

邓凯在致辞中谈到,纪录片是叙事的艺术,运用光影与文字反映出社会生活和人间百态,具有强烈的文学属性,与纪实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挥文学作品的母本作用,对于提升纪录片的叙事艺术、打造优质纪录片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次纪录片大会上,中国作协社联部从鲁迅文学奖参评报告文学作品中精选50部作品,逐一核实作品版权情况,将作品和作者简介印制成册向参会影视机构发放,并详细介绍近年来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创作情况。这50部作品涵盖题材广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凝聚了作者的智慧和汗水,是报告文学领域的佳作。

邓凯表示,中国作协社联部作为创投大会组织者之一,联合北京市广电局共同孵化报告文学影视转化项目。与此同时,中国作协社联部与首都纪录片协会将在纪实文学影视转化方面深度合作,不断挖掘纪录片行业人才和作品。未来,中

国作协社联部将继续向北京市广电局、纪录片制作机构推荐优质文本,在纪实文学向纪录片转化方面持续发力。

张苏在致辞中谈到,纪录片和报告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美其美。纪录片肩负着国家相册的使命,是一种以真实打动人心的艺术产品,用影像的力量见证历史、记录历史、观照未来;报告文学则以深入的调研、翔实的叙述和严谨的论证叙写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反映社会多姿多彩的面貌。纪录片与报告文学作为具有相似属性的文化产品,美美与共,两者都具有真实性、新闻性、文学性、艺术性,有很多相通的创作理念和思想精髓。本次活动探索打通两者相向引领的通道,创造两者相互赋能的契机、打造两者相互转化的桥梁,是一次崭新的尝试,相信一定可以创作出记录真实、传递价值、引领思想的优秀作品。

画好报告文学与纪录片的同心圆

在建何建明看来,报告文学和纪录片一直是亲兄弟、好姐妹。除基于作品整体版权出售的影视转化外,很多纪录片人喜欢跟着报告文学作家一起实地采访,“其实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会发现,报告文学作家更具有文学穿透力,纪录片人的新闻敏感性更强,这两者结合起来不失为文艺创作的最佳方式。”对此,纪录片领域专家学者表示高度认同,如果能够将纪录片“前采”阶段同报告文学作家采访过程凝练成一体、共同创作,最终结果会让双方作品的声音得到成倍放大。

赵捷感到,纪录片的文学性一直有待加强,当下许多纪录片导演存在“按方抓药”编画面的问题,似乎找到一位功底深厚的文学撰稿,导演按照文本插上画面就行,其实不然。“报告文学和纪录片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它们是同心圆,都是社会问题的发现者和国家未来的瞭望者。”他还谈到,当前纪录片创作的宏大叙事愈演愈烈,但缺乏足够多的真实人物纪实,纪录片是发现细节的艺术,报告文学也是如此。纪录片也好,报告文学也罢,不能写成一篇“大论文”,讲好中国故事

离不开触见真实。

李青松坦言,纪录片对他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影响非常大。他看完法国纪录片导演雅克·贝汉拍摄的《迁徙的鸟》时,理解了两个词:节制、情感。“《迁徙的鸟》”影片96分钟,但解说词不到500字。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我也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在作品中过多议论、展露自己的思想,思想应当靠作品本身的魅力反映出来。雅克·贝汉小时候掏鸟窝、观察鸟飞翔的各种姿势,在他看来人类有许多梦想,但是人类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像鸟一样飞翔,雅克·贝汉实现了。这部片子饱含情感,观众感受到鸟飞翔的美好,文艺创作最重要的还是情感。“有一次我去《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团队讲课,看到他们几乎把所有有关动植物、博物类的书籍都买来了,临走时还送给我几本我从来没有读过的书。”他建议,报告文学作家也一定要及时、广泛关注博物类书籍。

唯有真实才能让作品立于不败之地

作家王宏甲承担过多部纪录片的撰稿工作。在他看来,纪录片和报告文学的共同生命就是真实,“死守着真实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让作品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在纪录片《长征》撰稿过程中,他把作家们写得非常优美的语言拿掉了,“后来电视台、报纸采访我的时候,大标题就是‘打着赤脚写长征’。长征那么艰苦,用优美的语言去表现它合适吗?”王宏甲坚持用长征的语言、战士的语言去写长征,语言的准确性让纪录片向真实进一步挺进;他还谈到,拍纪录片不该沉醉于故事本身,而要讲求它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去思考我们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精神品质。“比如这把枪很好,但是我不是为了造这把枪,而是要考虑到瞄准、攻打的对象;我们造一条高级的船,也不是为了这艘船本身,而是为了要更快到达彼岸。纪录片选材时要考虑好拍片的目的究竟在何,万箭齐发冲着目的去,片子不可能不精彩。”

丁晓平同在场纪录片专业人士分享了自己在写作中的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一个人讲的不一定是真

的,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也不一定为虚,要努力创作出人人都知道却又不完全知道的作品;第二个口号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其必然”,要写出、拍摄出最有价值的历史和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丁晓平进一步谈到,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要整体联系、考察发展的历史,突破自身局限同样重要。

清除“双向奔赴”途中的路障

纪录片同报告文学“同祖不同族”,但为什么隔得这么远?陈大立感到,二者中间还有许多文字问题尚待探讨、解决。比如报告文学中的文字描述如何变成有效视觉?此外还有关于概念定义的问题,比如在文学领域,该如何清楚界定报告文学和长篇通讯,在纪录片领域很多人对纪录片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比如许多摆拍,加入人为调度、灯光的影片究竟是不是纪录片?我们需要通过学术沟通和交流,解决诸多认知上的偏颇,形成有力共识。

陈真拍摄过的多部纪录片作品曾荣获华表奖,在他看来,优质的报告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品牌,但也不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品都适合改编。曾经他在一次报告文学影视改编过程中,前期实地采访时发现书中绝大部分内容对不上,无奈只能另起炉灶调整创作思路。这也意味着,纪录片人需要找到真实的见证者,这一点至关重要。

最大限度发挥双方各自优势

纪红军认为,报告文学作家有很多资源和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报告文学作家非常会选题,他们知道这个时代需要写什么事、写什么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此外,由于报告文学作家很早就提前介入文学写作过程中了,其所掌握的资源优势不容小觑。”

李春雷坦言,自己在报告文学领域对小人物的关注较多,“常规来看可能不够震撼,但是每一个小人物背后,可能是一个深邃的世界。”他建

议,纪录片界也可以转换一下角度,在宏大叙事之余,从另一个角度写出别样的历史,从而拥有别样的味道。

赵学儒已经创作了5部南水北调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几乎见证了南水北调的全部过程。“我一直是所见所写,没有见到的不会写。我写的一个故事就是扎扎实实的一个故事,而不会把一个故事拉长、延展很多。”在报告文学的追求上,他希望一口深井,在水利领域写深、写透,希望提供给纪录片人第一手的创作内容。

张雅欣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和纪录片导演都是十分擅长讲故事的人,只不过讲故事所使用的工具不同。报告文学作家与纪录片人联手,对观众而言不仅能实现文学滋养、影视欣赏,同时也能实现原有读者群与观众群的互动交流。此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视听语言的影响力也能够更多助力文学作品走向世界。

高晓蒙所在的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纪录片行业第一个登陆资本市场的公司。他认为,纪录片+报告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达到“1+1>2”的效果,特别是面对一个热点社会话题、正面报道话题的时候,双方如果能够联手,对于投资方而言,其收益可能比各自单打独斗都要高得多。除了影响力之外,二者合力在解决重复介绍等方面减少了风险、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

研讨会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首都纪录片发展协会7家会员单位,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良友影视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北京鼓润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纪实(北京)传媒投资有限公司、真实影像·华夏元影(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双诚辉煌传媒有限公司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作品推荐目录”中挑选了包括《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实》《庄子传》《涅槃:北京动批三十年》《中国大提——北京大兴机场诞生记》《中国失踪儿童家庭的忧与盼》《永不打烊的警务室》《故宫文物南迁》等19部作品,有意将其转化为纪录片,视情况进行筹拍。此外,北京格竺影视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有意向将3集纪录片《桃李的天空》向报告文学转化。